

# 从接受美学视域 看《金瓶梅》中的“性”书写

曾庆雨<sup>1</sup>

中国云南民族大学

## 内容摘要

文学作品创作时,作者对于文本的书写多具有“隐含的读者”之存在性,这一类预设读者会植根于文本结构的全过程。作者写文本是一个不断与心中预设读者进行交流、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具体程度决定了文本写作所选择的整体结构布局,以及情感表露的全部特征需求,这也必然给创作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如材料的取舍,情节的安排,故事发展节奏的张弛,或对某个人物、事件的褒贬等等,包括文字的润色,甚至具体的书写或抄录方式都会受到这类预设“隐含的读者”影响。《金瓶梅》的写作过程也不例外。

**关键词:** 接受美学, 金瓶梅, “性”的书写, “隐含的读者”

---

1 曾庆雨, 中国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

##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代小说创作题材专注于写两性间“性”的内容，甚至以此作为创作主旨的文学作品，以明中后期为最盛，由此也形成了异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这四种类型所不能涵盖的另一体系——“这就是艳情小说系列”。<sup>2</sup>很显然，四大奇书之首的《金瓶梅》，因其对人情事理的深度刻画而成为世情小说的担纲作品，它本不应该与艳情小说这一分支扯上什么干系。可长久以来，《金瓶梅》因其文本中关于性描写的若干内容而名声昭著，以致艳名远播，久占我国古代性文学鳌头位置，且没有之一。

《金瓶梅》以世情和艳情，或说色情文学两两均沾、难以分割的文本存在状态，造成了历时长久的学术纷争不断，仅就小说的性质判定一端，至今仍处于难以分说明白的局面：且有世情说、色情说、写实说、现实说、宣欲说、戒欲说等等，不一而足。纵观种种论说，皆因受众自身的阐释立场不同，故所得出了差异性很大的结论。可这些各种的说法是否符合笑笑生对于作品叙事建构时的本真原意？笑笑生又是否有过对其创作时的“隐含的读者”有过某种程度的对话与接受？对于这些问题，目前的学界几乎毫无介入。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因为在传统的文学作品分析与批评语境中，习惯理解与文学作品相关联的“人”的属性很简单，那就是作者与读者之分。作者，亦为叙述者，或曰讲述人。读者即为接受者，或叫听讲人，仅此而已。而“隐含的读者”——传统叙事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之一种，在对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运用上还是有所空间。

所谓“隐含的读者”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德国著名的接受主义

---

2 刘琦、王汝梅：《明代艳情小说解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第2页。

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首先提出的理论概念：“他（指隐含的读者）预含使文学作品产生效果所必须的一切情感，这些情感不是由外部客观现实所造成，而是由文本所设置。因此隐含的读者观深深根植于文本结构之中，它表明一种构造，不可等同于实际读者。”<sup>3</sup>从伊瑟尔的论述中可知，“隐含的读者”是指作者本人设定的、能够把文本从构思到具体为文本的过程中，叙述者心中虚拟的，或说预想的非实体读者。这种预想中的读者，时而是作者生活经验积累的记述人，时而是作者思想的运力元，时而是故事发动的牵引者，时而是人物行动的陪衬人……，“隐含的读者”决定着作者写作的文本情感具有的特质和文本构建的全部形式。它们是作家结构文本时的一种原料存在，如同素材、故事、情节、人物、环境等等，是建构一部作品不可或缺的存在物。换言之，作者在写作文本时，已经有意识地设置了创作思维中具有指向性的“那个读者”的存在，它们其实是非实体存在的实际性读者。诚如梁启超所言：“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sup>4</sup>这话很清楚地说明，作者写作文本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与心中预设的读者做出交流和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决定了文本写作所选择的整体故事情节的结构布局，以及人物情感表达的所有特征。这样的预设读者存在势必会给作者的创作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往大了说，如材料的取舍，情节的安排，故事发展节奏的张弛，或对某个人物、事件的褒贬等等。往小了说，如对文字的润色，甚至具体的书写方式或抄录对象选择等都会受到这种“隐含的读者”影响。所以，赵毅衡指出：

---

3 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行为》，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53-254页。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8页。

“‘隐含读者’是‘文本结构期待的读者’。”<sup>5</sup>如此说来,《金瓶梅》既为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叙事文学文本,<sup>6</sup>笑笑生在构建文本时,必需有对“隐含的读者”(以下简称隐读者)做出预设,那么,如果一旦分析出他对“文本结构期待的读者”是怎样预设的?预设的根据又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能回答这些问题,应该能对长期以来对该文本的定性一直处于莫衷一是的争执状态的改变有所助益。

《金瓶梅》研究在历经了几百年的是是非非后,对文本创作主旨的定性判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观点,依照周钧韬的总结,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古人大体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淫书’”;二是“近人提出《金瓶梅》是一部真正的社会小说的观点,但没有为其摘掉淫书的帽子”;三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金学界提出了二十多种说法。……这二十多种说法中,值得注意的有四说:1.‘反封建说反腐败说’。……2.‘新商人悲剧说’。……3.‘人生欲望说’。……4.‘情色的温床’”。<sup>7</sup>该文罗列出16个层面的有关性书写的内容,并指出了四个方面的价值,继而提出“《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并认为是“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的全方位揭示”。周文学术视野开阔,对今人有意避讳谈《金瓶梅》性描写问题的研究态度亦有所批评。可问题在于那些影响文本性质的“性”书写意欲何为?依然是费人思量的。笑笑生究竟怎样预设这个文本的“隐读者”?他是如何限定“隐读者”在两性秘事描写

---

5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事学导论》,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第21页。

6 曾庆雨:《曾庆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5,第35页。

7 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5,第77-79页。

时放弃过多想象？他又是如何引导“隐读者”的参与度和指向？以及“隐读者”是如何应对笑笑生的书写策略呢？

## 二、“隐读者”产生原因及功能分析

既然“隐读者”是作者对自我心中“期待的读者”的设定，这些非实际存在的读者一直隐藏在作者创作文本的时时刻刻里，那么决定作者预设的读者类型只能与作者自身的认知环境、知识结构和书写能力有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用一个比喻加以说明：作者形同一名旅者，他通过截取一段行程的镜头来反映即时的感受和想法，这时能与之分享镜头感的只能是同行的旅人。该比喻在于说明，作者只能在他所熟悉的（认知环境）社会谱系中（镜头内容）选择文本的预设“隐读者”（同行旅人），而文本在结构（知识与能力）完成的过程中，预设的“隐读者”与作者互动交流，从而达到所成。因为作者与“隐读者”之间只存在有一个共同的文本参照（现实生活）的图谱系统，这包括着社会规范，即与“隐读者”和实际存在的实体读者所共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认知的因素，以及文学产生的暗示，即以往的文学传统或者过去的文学作品的投射。当然，这些因素是保留在作者意识中，这些因素的影响会反射在书写的文本中，但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复制，而是作者在结合了叙述需求后，对已有的文学素养和知识结构做出选择、组合、加工，之后使文本能传递出新的信息，而新信息则促使文本与“隐读者”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并得以完成。作者在书写时间中与“隐读者”发生的这种内部言语交流的表达，往往需要对词汇加以各种选择性的组织，而这种语汇的组织需要一定的技巧与方法。伊瑟尔把文本中组织材料（素材）显现的形式、技巧、结构称之为“策略”。

对一个叙事文本而言，叙说的策略限定了预设“隐读者”的想象范围，确定引导着“隐读者”的参与程度和指向规定，于此同时，“隐读者”也需要对这些策略进行应对，比如对讲述逻辑的反向推定，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就会出现故事的情节混乱，或者人物品格的对立等等。如此说来，《金瓶梅》在书写的策略中，笑笑生所预设的“隐读者”应具有他所需要结构文本的辨识意义和解读意义。

1、从辨识意义上看，笑笑生对材料（素材）选择和组织是直接和《水浒》挂钩的，这说明书写的策略是指向江湖人家非是乌衣高堂。他采用了继承章回体的书写形式，且指向是把个人生活经验浓缩到一个家庭生活的记述，并牵连出一个时代的三教九流，众生百态。选择这种市井人家的鸡零狗碎，后院女人的飞短流长的故事题材，未必唯“情色”描写方可叙说，《金瓶梅》之前之后的类似素材有不少也不用通过“情色”来讲述。这一点从《金瓶梅》现存的文本状态就能得到证明，因为删除那些直白的“仅占全书百分之二、三而已”<sup>8</sup>的性书写文字，并不影响该文本的总体构架和叙述过程的完整。既如此，笑笑生为何在结构文本时，一定要写入那些笔触笨拙的性描写文字呢？之所以认定《金瓶梅》性描写的笨拙，援引许建平的说法：“就叙事的方法而言，《金瓶梅》性文字的明显缺陷是公式化、雷同化。处处穿插着似骈非骈，似词非词的打油诗，……又由于这些文字多是从他处抄袭来的，不但文字粗鄙低劣，甚至有的驴唇不对马嘴，写夏天的却挪用到了冬天，冬天事又插入一段夏天。”<sup>9</sup>有关的详细例证，限于篇幅不引。很显然，《金瓶梅》与他同时代的艳情小说书写相较，笔法运用可笑，文字处理

---

8 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5，第80页。

9 许建平：《金学考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240页。

简单粗暴，与堪称艳情杰作的《肉蒲团》比看，《金瓶梅》的性书写简直就乏善可陈。如果文本是专意为写色情，《金瓶梅》其实是称不上突出的。可尽管笑笑生不擅长运用对文字处理，使其对性事的书写达到相应的精致和细腻刻画，使之形成较高的文学审美层面，哪怕仅仅是感官刺激层面的较高水平，但笑笑生还是很执拗地把这些内容编写进了文本当中，并企图以此起到勾连人物行为的方方面面，产生出好的人物形象刻画效果。他的苦心经营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作者笔下的性行为文字，有韵文，也有散文。那些大白话的散文，……大概正因为其真，所以也最能活现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间的关系，展露人物心理，显示丰富的生活内容，成为书中货真价实的文字。少了它，人物的关系、面貌就模糊不清，更难活起来。”<sup>10</sup> 由此可知，这样勉为其难的书写明显是有所针对，尤其当我们认为笑笑生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时，就更不能忽略文本创作的旨意所在。不善写性而写，不以写性为的而写，难道仅仅是因为文本的主旨就是要对“酒、色、财、气”所倾注的事理与人情需要统摄？劝解和教谕，显然并非是笑笑生叙事策略的全部内涵。

2、从解读意义上看，纵观中国文学发展，通过文本对两性关系中最为隐秘的部分直白写出或公开议论的，当以明代文学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猛烈。据相关统计知“明代艳情小说大约有三十余种”<sup>11</sup>。文学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出现了一大批充满情欲描写的作品：在小说创作方面较突出的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以及风月轩（又名玄子）的《浪史》，邱濬的《钟情丽集》，广野居士的《巫山奇遇》，以及《天缘奇遇》、《肉蒲

10 许建平：《金学考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238页。

11 刘琦、王汝梅：《明代艳情小说解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第2页。

团》等等，并以《金瓶梅》为压轴<sup>12</sup>。在戏曲创作流播方面，汤显祖以严肃态度编写的《牡丹亭》中亦有香艳的片段，何况在崇祯三年（1630）到十三年（1640）的十年之中，坊间大量刊行各种版本的《西厢记》剧本，在演出中拥有很多受众的《娇红记》、《玉簪记》等<sup>13</sup>亦被纳入色情违禁名册中，而更多真正带有色情意味的弹唱小曲，其时在市井间很是流行。而这方面材料在明人小说、笔记等都多有记述。在诗作方面，前七子诗文运动后，一贯以严肃道统面目自诩、视官方主流价值传播为己任，且对其他文学诸体持有睥睨的诗文创作状态终于出现了裂变，明中期祝允明（1460-1527）那颇具“标题党”之嫌的《艳体诗册》广为流传，到万历年间，则出现了被誉为“艳体圣手”<sup>14</sup>的王彦泓（1593-1642）名副其实，个性十足的诗集《凝雨聚》四册流播甚广，一时洛阳纸贵，颇具影响。

明文学对“性”书写的热情何以在这个时代如此的爆棚？后来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是“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sup>15</sup>导致文学集中做出了反映。这样的解读未尝不可，这对于说明笑笑生在创作《金瓶梅》文本时与“隐读者”之间，是同属一个社会规制导出的认知和心理谱系。可不好说明的一点，一般而言作家写作本身选择避短扬长是本能，笑笑生非得用不擅长的“性”书写作为建构整部文本的基线，这岂不是一种“扬短”吗？那么，《金瓶梅》的结构思考和书写策略会否不仅仅是看到社会的现状有所触动，或者因个人的遭遇产生了悲愤，而是有着与当时思想潮流的涌动，或者是人心的焦虑不安

---

12 刘琦、王汝梅：《明代艳情小说解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第2页。

13 丁淑梅：《明朝禁戏政策与明代戏剧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14 耿传友：〈王彦泓诗论——兼及文学史研究的观念问题〉，《薪火学刊》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第98页。

15 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5，第80页。

相关联呢？又或者他是以小说文本的方式来回应自身与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情感的困惑呢？这些问题在《金瓶梅》的文本中都有着程度深浅各异的涉及，这也恰好透露出笑笑生与“隐读者”对话是存在的，同时也证明了他们之间对话的指向是明确的。

### 三、书写策略指向以“性”为牵引的结论分析

既然《金瓶梅》中的“性”书写是这个文本中存在的事实，作者对于笔下各类性事描写的具体内容和设计的人物必然是有所考虑的，相信他也会有过下笔尤千钧的徘徊阶段。虽然没有材料证明笑笑生构建文本引入性描写是否只是为了统摄“酒、色、财、气”的劝诫主旨？但“就是《金瓶梅词话》开头，亦即在主体故事展开之前，一阙引词和一则入话故事，在此作者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一部《金瓶梅》写的就是‘情色’二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引词入话中，根本没有说到与朝廷黑暗、官吏腐败有关的话题，也没有说到商人发迹变态的话题。这说明在作者头脑中，根本就没有写反封建反腐败，写商人发迹变态等观念。”<sup>16</sup>如此说来，笑笑生是把写“情色”作为文本构建的终极目标，或者书写策略的话，那么笑笑生将面临的选择有二：要么专注于市场流行，感官刺激度高的两性间性事书写主题，以便于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取可观的润笔回报，这也是当时很多写手（以区别于作家）的选择；要么立意高标，专注于批判人在以“性”为本能中的身心迷惑与挣扎，道德的突破与往还，以及与之有关的生命伦理、人生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很明显的是，现今文本的内容证实了笑笑生做出的选择是后

---

16 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5，第79-80页。文中“发迹变态”一语疑“发迹变泰”之误。

者。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涌动的书场和书商中，对于“性”内容的书写和传播的热情，构成了《金瓶梅》写作时预设的“隐读者”成分，也构成了作者与“隐读者”之间的对话内容。倘若还原《金瓶梅》的写作时代，要理解“情色”于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重要性，其实并非难事。

《金瓶梅》文本的创作时间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认定，而认定的根据大多源于文本内所书写的内容，并由此进行举证：“遂有嘉靖说、隆庆说、万历说，中间跨越半个多世纪。”<sup>17</sup> 在明代建立到覆灭的二百多年中，恰恰在这半个多世纪是处于人的思想新锐活跃，文坛创作推陈出新的阶段。时下以程朱理学为表征的官方主流意识，受到来自阳明心学为缘起的新思想的挑战。人欲问题，首次成为中国历史上人们最为关注的一个思想问题。<sup>18</sup> 以李贽为代表的后泰州学派，更是直白地道出“人欲即天理”的观点。李氏著述影响巨大，流播甚广，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一时之间的晚明社会，凡有关“性”内容的书写能炙手可热的文坛创作和书刊市场奇观。但盛名之下其实难懂，真正能解读李贽思想者是寥寥无几的，这可从李贽身后文坛的萧条和写作内容向官方主流意识回归得到证明。而《金瓶梅》的出现，恰似一种孤鸣。笑笑生对“人欲即天理”之论说是有着深度思考和本质领悟的，唯其如此，才能解释他何以不顾自己写作的短板，而把“性”事的书写作为结构文本的基线，作为人物行为和命运的牵引。既然性欲是人欲的原点，“性欲是一种最激烈的情欲，是欲望中的欲望，是一切欲求的汇集。”（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笑笑生则必然要从剖析“性”的本质来看懂“人欲”与“天理”的相连关系，这是《金瓶梅》文本书写的思考所在，也

---

17 许建平：《金学考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10页。

18 章培恒：《明代文学与哲学》，上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是叙述的策略所在。所以，在移用《水浒传》中武松故事单元的同时，作者不仅把潘金莲与西门庆人物之间的性行为描写有所细化，还大量补充了与潘金莲发生实质性关系的男性人物，如陈经济。以及潘金莲有着性幻想的人物，如武松。在这些故事中，作者着笔最多的当属潘金莲和西门庆之间的性事书写描画。可不论是“醉闹葡萄架”（第二十七回），还是“兰汤邀午战”（第二十九回），直到“西门庆贪欲丧命”（第七十九回），潘氏与西门之间的性行为大多狂野而残忍。作者以文学的形象方式，给文本完型后的未来实际读者展示出了人性中最龌龊、最肮脏、最痛苦的一面，那就是两性之间，以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包裹起来的性征服、性虐待、性压榨、性交易和性暴力等非人性的性关系。而这类最不道德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往往也是最隐蔽的，它们很少被观察，也就很少被反映出来，自然也就很少会受到人性本质的追究。

笑笑生与他的“隐读者”在人欲的可控与膨胀，在伦理的底线与突破，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析辩和对话中，似乎一切都处于博弈和绞杀的状态。压抑人属本性是不道德的，泛滥无度的欲望追求同样是不道德的。而就在这样满溢着痛苦思辨的文本叙述书写中，实体的读者却从中看到了以“性”为标志的人的欲望膨胀，贪婪无度的惨烈和恶果。这种讲述显然与当时众多宣扬情欲放纵，沉迷性快乐的艳情作品的趣味和主旨大相径庭。这样与众不同的书写策略，便可视为是作者与其预设的“隐读者”在交流之后产生的文版呈现，可推想他们之间讨论的中心之一是有关“性”的愉悦是否就是“性”的全部意义？经过追问之后，作者采用新人物形象孟玉楼的介入，把叙说的空间结构由《水浒传》转移到属于《金瓶梅》

的新空间来<sup>19</sup>，并通过这一新人物，以及吴月娘、李瓶儿等人物形象，进一步阐释“性”的其他本质问题。

在有关“性”的书写内容铺排上，孟玉楼与吴月娘，她们两人与西门庆之间的性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家庭中比较正常的状态。他们之间对于“性”的欲望，根本上是符合人类社会繁衍后代，子孙绵延的共同伦理范畴的。故而，作者所用笔触简练且趋于干净。这是作者对于人之有“性”本能的认可，这样的“性”事是人伦之大道，无可厚非的生命延续的追求。文学文本理当书写这样的内容，这亦属无可厚非。就算是比较特例的李瓶儿，对她一生经历过的性事书写，其态度也是同情多过贬责，且最终让她定格在了以情为要的婚姻范围中。具体分析见后文。

对于西门庆与王六儿、林太太，以及青楼各色女子，府中仆妇们之间发生的性关系种种，其着意点在于两性关系于社会问题层面的剖析揭示上。其中写性交易用笔集中的是王六儿与西门庆之间，他们不仅是财色交易，更引出了贪赃枉法的命案，这才有了后来的实际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产生出揭示了社会黑暗，吏治混乱，是反映社会问题的观点。作者与“隐读者”之间对于性交易的看法也涵盖在西门庆与妓家女子和府中仆妇们之间发生的各式性关系的描写中：他们有的是资本利益链的交易（如大丫鬟们被送入翟府），有的是政治利益的交易（如西门庆暗中给官员们招妓），还有的是行业竞争的交易（如郑爱月与丽春院对西门庆的明争暗斗）等等。可不论是什么内容或目的，这些行为的发生都是以“性”作为筹码。而这些内容的组合，以及人物选择和描写，均有“隐读者”与作者间的讨论，交流，甚至砥砺存在才得以形成，这决定了该文本的结

---

19 曾庆雨：《曾庆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5，第21页。

构具有深厚的社会问题反映和广泛的社会多层面覆盖。

《金瓶梅》以人物形象塑造的方式，对两性间的“性”关系做出了从伦理的正常态向非伦理的异化态的考察，且把作者和“隐读者”之间的思考延伸到两性组合而成的家庭、婚姻、财产、子女等等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问题上，最终结构出笑笑生给实际的实体读者开放性批评选择：文学者看见悲悯，宗教者看见轮回，理学者看到人欲，道德者看见淫荡，从商者看见资本，从政者看见权势，性学者看见房中术，社会学者看见两性利益博弈。可不论实体读者属于哪种阅读视角，他们都会有“作者与读者的感情仍旧没个着落”<sup>20</sup>的失落感：悲悯无泪，轮回不果，人欲不达，淫荡少足，资本无恒，权势难永，房中泄恨，两性无情。人生的种种希望和期盼，人伦所应有的私密需求与人性中龌龊和肮脏的情结，正面与反面的，正向与反向的，它们不可中和，不可无视。这造成实体读者每每感到在选择阅读初始时所预期的各种心理指向目的，皆不能得到心理的完满。<sup>21</sup>

如果仅以两性关系得到全面选择的人物形象塑造而言，这个人物形象就是李瓶儿。李瓶儿与西门庆的两性关系中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变化。从开始西门庆为财，李瓶儿为色的错位交集，到两人对性快乐的共享，再到他们之间性关系的失落、重拾，直至走到了家庭出现，孩子出生，男女双方由性爱升华为亲情互爱。尽管文本中的李瓶儿以悲剧收场，可正好说明作者对“性”与“欲”的理解是很透彻的：性欲不是人欲的全部，也不是原罪。使得性欲变成罪恶的是贪婪，是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但人欲中还有一种叫精神欲，这

20 胡兰成：《谈论金瓶梅》，南京：《苦竹》第2期，署名江琦进，1944年11月版。

21 张曼娟：《〈金瓶梅〉，扑面而来的大爱》，红楼梦赏析，2016年3月7日。

是抗御物欲极度膨胀的利器。唯有精神欲望的不断攀升，人才会变得情操高尚，境界高尚，人格高尚。所以“人欲”合乎“天道”，亦合乎理性。从物欲的人到精神欲的人，这种转变大多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牺牲生命。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作者与“隐读者”之间的通过对话、交流，把文本从构思到完型，最终提供给实体读者有关“性”内容书写的意义有三：第一，“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无善恶之分，“性”具有社会伦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即繁衍子孙，传宗接代，延续文明。第二，“性”所具有的本体意义在于它属于人类最原始的身体快乐来源之一，即生理或感官的享乐感知的存在。人类以此而产生出了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体征的存在过程里，个体的人对社会伦理要求“性”是以情感为前提，家庭为载体的一种契合，当然也会有相背离的属性。第三，“性”所代表的符号意义在社会变异中发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延展，由此便出现了对“性”之本义的异化，甚至恶化，即在特定情形下出现的性暴力、性压迫、性索取和性交易等反人性行为，以及对性文化的禁忌和封杀等社会管制行为。由是可知，《金瓶梅》中的“性”书写，不论是笨拙的描述还是刻意的抄袭，其目的都是为了文本结构完成后的实体读者能够更多对于“人欲”问题的关注，是写给这些实体读者中能对两“性”本质做出全面解读的人看。这一点已经有学者看到，并提出《金瓶梅》明显受到了当时“心学”思想的深刻影响，<sup>22</sup>而史上第一位对《金瓶梅》“人欲”问题做出全面解读者当属张竹坡无疑。

---

22 杨绪蓉：《明清小说生成与衍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 参考书目

1. 丁淑梅：《明朝禁戏政策与明代戏剧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
2. 耿传友：〈王彦泓诗论——兼及文学史研究的观念问题〉，《薪火学刊》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3. 胡兰成：〈谈论金瓶梅〉，南京：《苦竹》第2期，署名江琦进，1944年11月版。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15。
5. 刘琦、王汝梅：《明代艳情小说解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
6. 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行为〉，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 许建平：《金学考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8. 杨绪蓉：《明清小说生成与衍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9. 曾庆雨：《曾庆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5。
10. 张曼娟：《〈金瓶梅〉，扑面而来的大爱》，红楼梦赏析，2016年3月7日。
11. 章培恒：〈明代文学与哲学〉，上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12.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事学导论》，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13. 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5。

# The "Sexual" Writing in "Jin Ping Mei"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Zeng Qingyu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In the creation of literary works, the author often has the existence of "implicit readers" in the writing of the text. This kind of presupposition readers will be root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text structure. The author's text writing is a process of constantly communicat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 readers in his mind. The specific degree of this process determines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layout of the text writing, as well as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which will inevitably bring more to the creation. The influence of aspects, such as the choice of materials,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lot, the rhyth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or the praise and criticism of a certain character or event, etc., including the polishing of the text, and even the specific writing or transcription methods will be subject to such presuppositions. "Implied reader" influence. The writing process of "*Jin Ping Mei*" is no exception.

**Keywords:** Reception Aesthetics, *Jin Ping Mei*, "sex" writing, "implicit reader"